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考

吴 小 珍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天下四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城北石鼓山上,书院历史悠久,地势独特。摩崖碑刻历代不绝,在全国书院独树一帜,是石鼓书院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文章在查阅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进行整理,并对其中存有歧义的“东岩西谿”、“太和题名”、“刺史蒋防碑刻”及“昌黎诗刻”等四种摩崖碑刻予以考释,以期丰富书院文化史研究。

[关键词] 石鼓书院; 唐代; 摩崖碑刻; 考释
[中图分类号] H028;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6-0094-06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85

一 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基本情况

石鼓书院创建于唐代,初名为李宽中秀才书院,是中国最早产生的书院之一。书院建址于衡阳城北石鼓山上,此山“其形如鼓,屹立于蒸、湘二水之间”,“葱郁秀丽,为一方诸山之最”[1],书院以山为名,山以书院为盛,慕名来此揽胜观景、讲学论道者历代不绝。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在名山胜迹题壁刻石以记事抒怀的传统,石鼓书院与山一体,山体纯石,地势独特,是以书院摩崖碑刻历代不绝,遍布整个石鼓山,其年代之久远,数量之繁多,在全国书院独树一帜,尤以唐代时期的摩崖碑刻弥足珍贵。相关记载最早见于宋人文集、地理志与金石著录等文献资料。范成大《石鼓山记》云:“石鼓书院合江亭今绿净阁,西廊外石磴缘山,谓之西谿,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齐映诸题名’”[2]18。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录石鼓书院唐代碑刻 2 种,南宋佚名《宝刻类编》载录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各一种等。明清以后,载录与考订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的文献资料日渐增多,如乾隆《清泉县志》载录 6 种,嘉庆《古泉山馆金石文编》载录 3 种,嘉庆、光绪《湖南通志》载录 11 种,同治《八琼室金石补正》载录 3 种、光绪《石鼓书院志》载录 6 种等。

以上历史文献资料,是整理与考证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的重要文字依据。笔者在仔细查阅、比对多种不同历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结合书院实地调查,对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及存佚情况进行整理。可以确定,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共有 15 种,见表 1。

表 1 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形制类型	分布地点	存佚情况
1	“东岩”二字	摩崖	石鼓山东岩石壁	无存
2	东岩诗题刻	摩崖	“东岩”二字之上	无存
3	东岩记碑刻	碑刻	石鼓山北合江亭东侧	无存
4	“西谿”二字	摩崖	石鼓山西溪岩壁	尚存
5	西谿诗题刻	摩崖	“西谿”二字之上	无存
6	西谿记碑刻	碑刻	石鼓山北合江亭西侧	无存
7	“钓台”二字	摩崖	石鼓山东岩之北水中	无存

[收稿日期] 2022-07-07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衡阳书院与湖湘文化关系研究”资助(编号:2017A001)
[作者简介] 吴小珍(1975-),女,湖南道县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续表

序号	名称	形制类型	分布地点	存佚情况
8	“合江胜□”四大字	摩崖	石鼓山东岩石壁	无存
9	“朱陵后洞”四大字	摩崖	石鼓山北朱陵后洞左下侧石壁	尚存
10	刺史蒋防碑刻	碑刻	石鼓山北合江亭附近	无存
11	太和题名	摩崖	石鼓山西溪岩下	尚存
12	“窪尊”二字	摩崖	石鼓山西谿崖下蒸水岸边巨石上	无存
13	唐李吉甫西溪题名	摩崖	石鼓山西溪岩壁	无存
14	唐齐映西溪题名	摩崖	石鼓山西溪岩壁	无存
15	合江亭“韩伯留题”	摩崖	石鼓山北合江亭附近崖壁	无存

由表 1 可知,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以摩崖题刻为主,伴以二、三碑刻,参差分布于石鼓山东、西、北三面岩壁及附近滨水处,其中:石鼓山东岩 4 种,石鼓山西谿 6 种,石鼓山北(含合江亭、朱陵后洞)5 种;迄今保存完好的有 3 种,皆为摩崖题刻,即“太和题名”、“朱陵后洞”四字与“西溪”二字。

现择其有疑义者,“东岩”与“西谿”及其相关诗文题(碑)刻、“太和题名”、“刺史蒋防碑刻”及“昌黎诗刻”四种摩崖题刻分别予以考释。

二　石鼓书院唐代摩崖碑刻考释

(一)“东岩”、“西谿”四字及诗作题刻、“东岩记”、“西谿记”碑刻考

“东岩”、“西谿”四字为石鼓书院著名题刻,年代久远,素负盛名,石鼓山东岩、西溪称谓即缘于此。二者分别位于石鼓山东、西两侧岩壁,皆无落款。“‘东岩’二字,二石各高一尺六寸,广一尺七寸,各一字,字径一尺二寸许,分书;‘西谿’二字,高一尺四寸,广三尺八寸,横列二字,字径一尺,正书”[3]33。

“东岩”与“西谿”题刻的形成年代及其书者,一般认为是贞观年间衡州刺史宇文炫。明《永乐大典》卷九七六六,《二十二覃·岩》:“东岩在湖广衡州府衡阳县北合江亭东,唐贞观十五年,刺史宇文炫建亭以为登览之所,面对岩壑,故名”。明嘉靖《衡州府志》卷六《名宦》:“宇文炫,唐太宗时为衡阳太守,贞观中时和岁丰,民安物阜,于石鼓山东崖、西溪有诗。”明万历二十一年《衡州府志》卷一《山川志》:“太守宇文炫于石鼓之东题曰‘东岩’,西曰‘西溪’,石上有诗,已剥落不可读”。明万历十七年《石鼓书院志·上部·地理志》亦云:“东岩,在石鼓山东北,壁立数仞,为书院八景之一;西溪,在石鼓山之西,俯临蒸水,夜月晚眺,水天一色,刺史宇文炫石刻尚存,具八景之一”。该志《名宦志》云:“宇文炫,贞观中为衡州刺史,多善政,增修合江亭,建东岩、西溪二亭”。

清代以后的各种文献记载,志书如《湖南通志》、《衡州府志》、《清泉县志》、《衡阳县志》以及《石鼓书院志》等,金石著录如《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皆从此说,未有异议。

前述文献材料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宇文炫除在石鼓山东、西岩壁题刻“东岩”、“西谿”四字外,又在四字之上留有诗作题刻,后因年代久远而剥落不可读;(2)宇文炫题刻的具体时间是贞观年间,确切地说是贞观十五年。对此,有关“东岩”、“西谿”四字摩崖及其相关诗题刻历史,有几点须加以辨证或予以补充。其一,题刻者为宇文炫的说法虽确,然未言及所本何处。其二,题刻时间记载不确,即题刻者宇文炫任职衡州刺史时间记载有误。其三,宇文炫在石鼓山的题、碑刻活动记载不全,尚有缺失遗漏。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五《荆湖南路·衡州》之《碑记》云:“《东岩记》在合江亭东,正观五年刺史定宇文氏记;《西谿记》在合江亭,宇文氏有铭”。《舆地纪胜》约成书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该书据各郡图经,录其要略而成。这是已知有关宇文炫石鼓山刻石活动的最早文献记载,由此可确定,他任职衡州刺史期间,除在石鼓山东、西岩壁分别留有“东岩”、“西谿”四字与诗作题刻外,同时还在合江亭东、西两侧各立有“东岩记”、“西谿记”碑记(铭)一通,可惜诗文与碑记(铭)早佚,不见之任何记载,殊为遗憾。

另,《舆地纪胜》谓宇文炫碑立时间为“正[当为‘贞’字之误]观五年”,与后世记载不符(见前述,明《永乐大典》云“贞观十五年”)。碑刻与题刻虽然形制相异,但作者乃同一人,主题亦相同,何以二者形成时间相差十年,显然不合常理,其中必有一错。事实上,不管是“贞观五年”之说还是“贞观十五年”之说,二者记载皆不确。

据《唐会要》卷三五:“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并上制书事二十馀件,疏奏不报”。又据北宋《册府元龟》卷四八一:“张彧,贞元十四年自刑部侍郎除卫尉卿,初有诏,令三司使推按僧法凑狱,不叶颇甚,中丞宇文邈上表辞官,不许,彧时又疾病,请归休,帝意以为假托事故,彧改官,邈受令,刑部郎中宇文炫同推事,以邈与炫宗姓,又改令卢虔”。再,明《永乐大典》卷八六四七“衡州刺史”条:“宇文炫,贞元十五年”。综合以上材料内容,可以确定:宇文炫于唐贞元三年(787)官右补阙,贞元十四年(798)为刑部郎中,次年即贞元十五年(799)任衡州刺史。因此,宇文炫在石鼓山题刻及碑刻之举,当在唐贞元十五年或之后的几年间。

另,“贞元十五年”、“贞观十五年”与“贞观五年”,三者若从文字书写印刷角度来看,容易混淆。因此,不排除后二者因字误、字漏等原因,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如《舆地纪胜》云“贞观五年”当为字误兼字漏,即将“贞元”误写为“贞观”,在“五年”两字前又漏写“十”字;又如《永乐大典》所载则纯属字误,同一书不同之卷言同一事,竟然一说在“贞观十五年”,一说在“贞元十五年”,显然将“贞元”误写为“贞观”),是以后世皆误以为宇文炫题(碑)刻于石鼓书院的时间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而非一百六十余年后的唐德宗贞元年间。可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二)太和题名考

太和题名,又称“唐刺史裴□等题名”,清代以前未见于任何文献记载。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寓居衡阳的清代学者江昱在石鼓书院搜访摩崖碑刻时,偶然发现该题名,其文集《潇湘听雨录》中有详细记载:“乾隆丁丑九月,令仆夫前曳后拥,缘崖搜讨前人磨刻凡数十处,惜石质粗疏,剥落过半,有‘太和九年’刻藏于崖下……其‘太和’题名,高一尺,阔少赢,字大寸许,书右行,体近欧阳。刻手亦善其文,曰‘衡州刺史裴□、监察御史陈越户、部从事閻斯琴、客张贽,太和九年九月十日同游’,凡六行三十二字,缺一字。余尝有句云‘绝壁苔封刺史名’,盖指此出”[4]2。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江苏甘泉人,廪贡生。乾隆二十一年,衡阳新增清泉县,其弟江恂出任县令一职,昱遂至衡州,“居恂署数年”。江昱醉心于金石之学,自云“余客湖湘,于其地之碑刻聊就力就致者畜之”[4]8。其弟江恂亦有此好,公务之余常与乃兄一起,着意于湘省各地摩崖碑刻的搜集与整理。任职清泉县令后,尤注重对石鼓书院摩崖碑刻的保护。乾隆庚辰年间,江恂鉴于石鼓山游客往来喧哗,为避免干扰书院师徒教学,遂下令重开西谿栈道,不由书院直达合江亭胜槩,颇觉一新,“修理需石,或议亭内、外碑如插笏,有駁蚀无一字者,信可毁之”。对此他坚决予以反对,明确表示书院碑刻中“无一字者,安知非唐宋旧物,毁之,终不安”[5]。江氏兄弟精于金石之学在当时颇有声名,远在京师的金石学大家如钱大昕曾专门慕名到访石鼓书院,邀请江昱一同考察书院合江亭后岩壁的摩崖石刻诗文,“摩挲不忍去”[4]6。

太和题刻被发现后,湖南省、府、县志及光绪石鼓书院志先后载录,著名金石学家瞿中溶、陆增祥等亦先后将其收录各自的金石著录中。由太和题名内容可知,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九月十日,衡州刺史裴氏与监察御史陈越石、郡从事閻斯及琴客张贽等四人同游石鼓书院,并将此举题刻于西溪崖壁,以为纪念。题刻中提及的四人,后二者“閻斯”与“张贽”身份较低,具体何人无从考据。关于閻斯的职衔,陈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考订题刻中“部”字为“郡”字之误[3]33,即閻氏之职当为郡从事。可知他时为衡州刺史属官。《隋书》卷二二《百官志·下》:“上上州刺史,置府。……州属官,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书佐,市令及史,祭酒从事史,部郡从事……等员”。部郡从事乃隋代于各州置此官,隶属州牧,掌督促文书举非法事,秩从九品,简称部郡从事。《新唐书·百官志》虽无“从事”一职,但唐代史籍中经常出现“从事”这一专有名词,如郑谷《南康郡牧陆肱郎中辟许棠先辈为郡从事,因有寄赠》一诗[6],可知唐代“郡从事”有之,泛指所有幕职。

又,监察御史陈越石。按:监察御史一职,《新唐书·百官志三》:“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陈越石,《潇湘听雨录》作“陈越户”,不确,嘉庆《湖南通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皆作“石”。《钦定全唐文》卷七二三“陈越石条”:“越石,颍州人,初名黄石。元和十五年进士,官蓝田令,会昌三年卒”。由此可知,此次石鼓山雅集,当为陈越石升职外放为蓝田县令之前。

衡州刺史裴氏是太和题名四人中职衔最高者,因其姓氏后缺一字,且裴姓刺史未见载于《衡州府志·职官志》,瞿中溶、陆增祥等人据此认为裴氏其人身份“无可考”[7]。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确定:衡州刺

史裴氏，其名裴浰。有关其人其事的文献记载不多，共有两条。兹录如下。

“元举牒判官摄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里行裴浰，计两州徵钱共七千贯文，米共五千石”。

“敕：朝散大夫前守蓬州刺史上轻车尉裴浰、朝议郎前守通州刺史赐绯鱼袋郭曛等：夫上之化下，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耳。以尔等前所为政，皆播能名，人多裤襦之谣，理有绥定之绩。衡阳、苞湖，赋繁地阔，尤藉良牧，以扇仁风，勉奉诏条，陟明斯在。浰可守衡州刺史，散官，勋如故；曛可守利州刺史，散官，赐如故”。

第一则材料来自唐元稹的《弹奏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严砺文》[8]。由此可知，元和四年，裴浰时任东川节度判官兼监察御史里行，据《唐书·百官志》，判官系节度使佐属，分判仓、兵、骑、胄四曹事，多由藩镇自行辟置，位在行军司马、副使之下，其权极重，几乎等于副使[9]。该年八月，元稹（字微之）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钱七千贯。时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10]。裴浰作为参与涉案官员之一，被元稹一并弹劾追责，自然也受到相应责罚，至于具体何种责罚，因史籍缺乏不可考，但不可置疑，此事必然会对其仕途产生严重影响。

第二则材料来自唐李虞仲《授裴浰郭曛等诸州刺史制》[11]。该制文未署年月日期，查其撰者生平可知其大致年代。李虞仲，字见之，赵郡人。“元和初，登进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书。从事荆南，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司勋郎中。宝历中，考制策甚精，转兵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太和四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12]。由此推测，李虞仲知制诰、掌草拟诏敕在宝历中至太和四年期间，《授裴浰郭曛等诸州刺史制》当撰于这一时期。结合太和题名的具体日期，我们可以确定，裴浰出任衡州刺史的时间最晚不会迟于太和四年，至太和九年尚未离任，换言之，他任职衡州刺史的时间至少在六年以上。

查，唐代刺史任期一般为三至四年。唐《通典》卷十七《选举五·杂论议中》：“今之在任，四考即迁”。又如：与裴浰活动年代接近的宝历元年（825）正月敕文：“刺史、县令，若无犯，非满三年，不得替”[13]。但亦有例外。相对来说，偏远地区的刺史任职时有延长，唐代衡州属江南西道，邻近岭南蛮荒，向被视为偏僻之地，常作为官员的贬谪场所。柳宗元《送李谓赴京师序》云：“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14]。唐代衡州刺史中不乏贬谪之人，如齐映、吕温、令孤楚等皆是如此。但是与衡州相比，属山南西道的蓬州显然更加偏远荒僻；因此对裴浰而言，朝廷将其从蓬州调至衡州担任刺史，虽然官职未变，其实隐含重用之意，故制文云“赋繁地阔，尤藉良牧”。

（三）刺史蒋防碑刻考

刺史蒋防碑刻现已无存。蒋防其人，据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六：“蒋防，字子徵，义兴人，澄之后。年十八，父诫令作《秋河赋》，援笔即成，警句云：连云梯以迴立，跨星桥而径渡。于简遂妻以子。李绅即席命赋《韝上鹰诗》，云：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伸识其意，荐之，后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15]。嘉庆《湖南通志》卷二零七亦简单介绍了蒋防其人其诗：“蒋防，义兴人，官右拾遗，元和中李绅荐为司封郎中，知制诰，进翰林学士。李逢吉逐绅，因出防为汀州刺史，《全唐诗》录其诗十二首，而合江亭诗未收，此诗盖其官衡州刺史时所题也”。《通志》称其为合江亭诗，缘于南宋《宝刻类编》的记载。

据南宋金石著录、佚名撰《宝刻类编》卷五：“贺拔恭，蒋防题合江亭诗，太和元年六月上旬，潭衡”。贺氏生卒年不详，与蒋防同时代人。《摭言》云：“恭长庆中与白敏中同进士第；按《金石略》：唐白居易重修香山寺诗，贺拔恭书。按《书史会要》：贺拔恭官至员外郎，有书名[16]。《宝刻类编》编写特点为“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由此可知，蒋防任职衡州刺史大致在太和元年前后，撰诗时间在该年六月上旬，由贺拔恭书立碑。

刺史蒋防碑刻还见载于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所撰《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衡州石鼓山旧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时，侯以军师中郎将驻临蒸，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赋以供军实。临蒸，今衡阳县是也，蒸水出县境，径石鼓山之左会于湘江，则其庙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韩愈及刺史蒋防诗碑，祠之立其来远矣”[17]。该记文是乾道四年张栻应湖南提举常平范成象偕提刑郑思恭、衡州知州赵君迈书请而作，由此可知，至少在宋乾道四年以前，蒋防合江亭诗碑尚完好留存于石鼓书院内。遗憾的是，因《全唐书》未收录蒋氏合江亭诗，是以相关历史文献包括明清《石鼓书院志》及省、府、县志皆未载录具体诗文。目前所见，仅南宋《舆地纪胜》卷五五《荆湖南路·衡州·诗》附录残诗两句：“‘始

有诸葛翁,柯亭寄幽蔼'。诸葛亮在临蒸时尝有宅,故蒋防诗云"。

(四)昌黎诗碑考

乾隆《清泉县志》载石鼓书院宋元祐三年摩崖题刻,中有"既饮,与宾客下合江亭,观韩伯留题"等字句[18]3。"韩伯"当为宋人对唐代大诗人韩愈的尊称,"韩伯留题"则应为韩愈当年访石鼓书院时所留题刻。据《韩文类谱》卷五《韩子年谱》载,永贞元年(805)韩愈"自阳山移江陵法曹……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可知韩愈入衡州后,应刺史邹君邀请至石鼓书院揽胜,登合江亭观景,并留下诗作。对此,有学者如郭建衡提出疑问,认为元祐三年题刻中提到的"韩伯留题",究竟是将韩愈合江亭诗刻石,还是当年韩愈游览合江亭时另有即兴之题,已无从知晓[19]。郭建衡先生用力甚勤,他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书院曾存有韩昌黎诗碑一通。一般认为该诗碑系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手书,明清志书、记文以及金石著录等皆有载录。明万历《石鼓书院志》上部《室宇志》:"合江亭在石鼓山阴,蒸湘二水,合流于前。……唐韩昌黎自山阳徙江陵,与刺史邹君会于亭上,后寄古诗二十韵。宋张南轩刻石置于亭中"。这是现存最早有关张栻书韩愈诗碑的文献资料记载,明清各志书、记文以及金石著录所载,皆本此。

但是明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都没有这一方面的记载。查阅宋人文集,有两篇文章明确提到了石鼓书院韩愈合江亭诗碑,不仅如此,以撰文者身份及其与石鼓书院的特殊关系而言,他们的文章内容可谓是张栻书韩愈诗碑的有力反证。一是张栻的《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相关文字见前引,此处略)。由其文可知,早在乾道四年张栻应邀撰写此记以前,已经有韩愈合江亭诗碑与前述刺史蒋防诗碑并立于石鼓书院内;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即张栻出于尊崇昌黎之意,亦手书韩诗,勒石立于合江亭。二是范成大的《骖鸾录》,该书是"乾道壬辰成大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时,纪途中所见",次年即乾道九年(1173)二月十二日,范成大至衡州,十三日、十四日泊衡州,谒石鼓书院。"合江亭见韩文公诗,今名绿净阁,亦取文公诗'绿净不可唾'之句。退之贬潮阳时,盖自此横绝取路以入广东,故衡阳之南皆无诗焉"[2]18。所记内容不仅与张文相互印证,并且还指出了昌黎诗碑所在具体位置,即合江亭内。

巧合的是,范成大之兄恰是前文提及的、书请张栻为石鼓书院诸葛武侯新庙作记的常平使者范成象。范氏兄弟感情深厚,关系友善,是以范成象邀请张栻为武侯祠作记一事,范成大必然知晓,此其一;鉴于范成象与张栻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在石鼓书院合江亭内所见昌黎诗碑,如果确系张栻书立,必然会特别留意并在文章中专门提及,但通读其文不见一字涉及,令人颇感奇怪。此其二。

又,证明合江亭昌黎诗碑并非张栻书立的另一有力证据,就是宋元祐三年题刻。题刻首句为"元祐三年戊辰秋八月十有八日",末句为"既饮,与宾客下合江亭观韩伯留题□□□□水环□汤汤以"[以后约缺三十馀字]"[18]3。据此可知,早在后世公认的南轩书昌黎诗碑产生之前七十余年,即元祐三年(1088),提点刑狱朝散郎张公绶与衡州知州、衡阳县令等一干人,就已在石鼓书院合江亭内欣赏"韩伯留题"了。从前述分析我们已明确,宋代合江亭内昌黎诗石刻,其形态是碑刻而非摩崖题刻,乾道四年虽然较元祐三年晚若干年,但百年之内,同一题材不可能以两种石刻形态并存于同一地点,这样做既无必要,也属多余。

据此,我们甚至可大胆推测,宋元祐三年张公绶等人在合江亭流连欣赏的"韩伯留题",亦即七十余年后即乾道年间张栻记文提及、范成大亲眼所见的昌黎诗碑,极有可能就是韩愈本人亲书,正如其诗云"愿书岩上石,勿使尘泥涴"[20]。作为诗作寄题对象的衡州刺史邹君,必然会满足好友心愿,将诗作刻石于合江亭,供后人瞻仰吟唱。

[参考文献]

[1] [明]李安仁,王 大. 石鼓书院志:卷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
[2] [宋]范成大. 骖鸾录[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清]陈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二[M]. 影印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
[4] [清]江 昱. 潇湘听雨录:卷七[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5] [清]江 昱. 潇湘听雨录:卷五[M]. 济南:齐鲁书社,1997:9.
[6] [清]彭定求,沈三曾,等. 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
[7] [清]瞿中溶. 古泉山馆金石文编:卷三[M]. 影印乌程张钧衡适园刻本:13.
[8] [唐]元 稹. 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七[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
[9] [宋]欧阳修. 唐书:卷四十九下[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
[10] [后晋]刘 昫.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

[11] [宋]李 昉,徐 铉,等. 文苑英华:卷四百一十[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
[12] [后晋]刘 昫.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
[13] [宋]苏 冕,杨 绍,等. 唐会要:卷六十八[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2.
[14] [唐]柳宗元. 柳河东集:卷二十三[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
[15] [清]陈梦雷,等.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 氏族典:卷四百四十一[M]. 蒋廷锡,校订. 武英殿印本:59.
[16] [清]倪 涛. 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三十一[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
[17] [宋]张 栻. 南轩集:卷十[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
[18] [清]江 恂. 清泉县志:卷二十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9] 郭建衡. 石鼓书院[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17.
[20] [宋]魏仲举.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4.

Research on the Cliff Inscrip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Shigu Academy

WU Xiaozhe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four colleges in the world, Shigu Colleg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the city of Hengyang Shigu Mountain, and it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unique terrain, grinding cliff inscriptions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which is unique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higu college. 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cliff inscriptions in Shigu Academy in Tang Dynasty, and analyzed and explained four kinds of cliff inscriptions with ambiguity, such as "Dongyan Xixi", "Daihe inscription", "Jiang Fang inscription of The Shi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hangli Poem inscription", in order to enrich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cademy.

Key words: Shigu Academy; Tang Dynasty; cliff in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本文编辑:刘衍永)